



1 新 潮

五四運動，學生遊行隊伍向天安門進發

© 2018 香港城市大學

歷史是需要想像力的。如若不然，僅憑二十一世紀的生存經驗，譬如去股票交易所，徜徉於時裝商場，打高爾夫，選美，在室內練習翻牆，等等，必定無法感受一百年前中國社會的整個氛圍，更說不上理解。那時，帝制時代結束了，共和時代剛剛開啟。兩個時代之間造成的短時段的裂隙，鬆弛，混亂，猶如神話小說中的魔瓶，偶爾揭開蓋子，那個被壓抑了幾千年的自由的精靈便趁機逃逸出來了。

老王朝的權臣、政治強人袁世凱意欲侵吞革命的果實，不得不喬裝為共和主義者。但當他自覺坐穩了大總統的寶座，策動群僚勸進，詔令稱帝時，想不到抗議之聲遍於全國，「二次革命」勃興，結果憂懼而死。隨後「辫子軍」張勳復辟，更不用說是一齣小鬧劇了。個人獨裁搞不起來，政黨獨裁也搞不起來，所謂「共和」，雖然說不上深入人心，畢竟有新鮮感；其自由平等的意涵，無論如何容易為長久生活在專制的窒息的空氣中的人們所接受。而一些野心家、陰謀家，一時也找不到合適的落腳的位置。這叫「民意」。用盧梭¹的概念，也可叫作「公意」。

在傳統社會，顛覆性的力量只有農民，這時多出城市工人和市民。從法國大革命到俄國革命，城鄉力量結成政治同盟，同時投入到革命的烈火之中，這樣一種歷史經驗，已經能為中國的革命者所採用。還有兩種新興的社會勢力：其一是政黨，再就是知識分子集團。政黨組織嚴密，鬥爭的目標直指國家政權，因此常常秘密作業，帶有地下性質。知識分子不同，集團的結構十分鬆散，而且是公開的攪局者；作為價值觀念的創造者、闡釋者和傳播者，唯恐天下不亂，但是他們之所以注目於政權者，惟是為批判而批判罷了，這是他們不同於政客的地方。此外，還有一種無形的勢力，就是意識形態。它被製作

為成打成打的綱領、文件、口號，猶如一種黏合劑，聯合各種不同的黨派勢力並為它們所利用。沒有它，現代政治運動不可能實現廣泛而有效的社會動員。

民國成立前後是一個密雲期。中央政府趨於衰微，政黨出現新的分化和組合，工農力量依然處在沉睡狀態，這時，社會失去中心，太陽隱匿，雷鳴電閃便只有知識分子。他們懷着一種緊迫的使命感，探索中國的出路。與同盟會的革命父輩不同的是，他們不再注重國家，注重政治革命和武裝鬥爭，而是傾心於社會革命。短短數年，西方的許多有關社會改造的思想湧湧進入中國，社會主義大行其道。其中，無政府主義以其激進性，對青年一代特別富於吸引力。

新興知識分子最早接受十八、十九世紀法國革命思想的影響，大約也因此染上法國式的英雄主義氣質。他們熱烈嚮往法國的烏托邦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在所有提倡社會革命的人中，具有無政府主義傾向的人數最多。老資格的無政府主義者李石曾、吳稚暉、蔡元培等發起「留學儉學會」，實行「工讀」，鼓動和幫助學生到法國學習，此外還有大批勞工出國，壯大了無政府主義的影響力。他們先後成立許多團體，分散於北京、上海、南京、天津、廣州、福建漳州、漢口、成都、長沙等地；在國外，除了法國，新加坡、菲律賓和美國的三藩市、加拿大的溫哥華等地也都有中國無政府主義者的社團。這些社團出版時事通訊、刊物，還有無政府主義經典著作的中譯本。1915年以後，無政府主義從中國思想界的邊緣進入主流，火山活躍帶隨之轉移到北京尋找爆發口。

首都北京有《新青年》，有北京大學，有應運而生的新文化運動。而無政府主義的主題，恰恰把文化革命看作社會革命，這樣便擁有了一個有利於自身發展的革命環境。當無政府主義者投入新文化運動以後，顯著地影響了運動的整體傾向和進程，甚至運動中的許多流行語，都是來自現成的無政府主義語言。正如德里克²簡潔地指出



五四運動，天安門廣場

的：「如果社會變化是1909年五四運動時期進步刊物提倡的和討論的『心臟』，那麼無政府主義語言則是用來表達這種思想的『舌頭』。」

五四運動是一場愛國運動，一場由帝國列強對國家領土主權的侵凌所激發的社會運動。表面上看來，它與新文化運動是相悖的，而且，事實上，隨後也很快地政治化和黨派化，然而，它無疑地又是新文化運動的一部分，一個新的里程碑或轉捩點。

火燒趙家樓是五四運動最富有象徵性的場景之一。放火者是年輕的無政府主義者匡互生。從那時開始，他便把一生交付給了解放大眾的事業，雖然他的名字已為人們所遺忘。那時，無政府主義的變革觀念得到運動的切實有力的呼應，一種先鋒的思想狀態和飽滿的青春激情被推到運動的前沿。五四期間，新成立的無政府主義團體多達幾十個，出版物近百種。像《新青年》這樣被稱作「新思想的源泉」的刊物，也大量刊登無政府主義者的作品。他們製造話題，發起並展開廣泛的討論。《新青年》有許多議題：孔教、歐戰、白話文、世界語、偶像破壞、家族制度、青年問題、婦女問題、人口問題、勞動問題、教育問題，包括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等等，都是無政府主義者幾年

間先後接觸過、討論過的。德里克研究指出，連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最初在中國引起的就不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興趣，而是對無政府主義的興趣。中共早期活動的人物，如李大釗、毛澤東、蔡和森、瞿秋白，周恩來、惲代英、彭湃、陳延年等，都曾經是無政府主義的信徒。無政府主義者團體是當時唯一有組織的激進派團體，他們不但努力宣傳無政府主義，而且積極參與組織激進主義活動。經過五四運動，無政府主義作為一個時代的思想主潮，隨同新文化運動的進一步傳播，迅速擴及全國。



《青年雜誌》（《新青年》的前身）

「無政府主義」，也稱「安那其主義」。「安那其」（Anarchy）是譯音，源於希臘文，意思是沒有武力，沒有強權，沒有統治，指一種無政府的情形。「無政府主義」一詞於1903年首次在中國出現，1906年以後，由無政府主義者宣稱社會先於國家，即與國家相對立時，這才正式確立了自己的身份。大約1913年至1914年，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作出明顯的區分，到了二十年代初期，又和馬克思主義劃清了界限。但是，不管在任何時候，無政府主義都把政府看成是社會進步的阻礙，甚至是人類的禍害，而把廢除國家和它的一切機構作為最基本的宗旨之一。



《新青年》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

中國的祖先崇拜是有名的，由此生出一種家國意識，千百年來代代相傳，可謂根深柢固。家國同構，家天下，大一統，國家權威至高無上。漢代大將霍去病說的「匈奴不滅，何以家為」成了大國臣民及其繩子孫的信條。可是，在早期的無政府主義者看來，「專制國無所謂國家」；他們稱引孟德斯鳩³，說在專制國家裏，真正的愛國者只有帝王一人。國家是一人的私產，而不是人民的公產，「國之強盛與平民之幸福無關」，因此，愛國是沒有根據的。在當時，他們就宣稱：「平民之祖國在全世界」。

清末許多政治精英和知識分子都擁護改良主義，實質上，那是換了一副溫和面孔的國家主義。劉師培倒很清醒，當時便指出，清政府的所謂「新政」，不可能如許多人所希望的那樣，將會達致政治開放和社會進步。推翻清帝國以後，革命派在中國面臨外來軍事威脅，內部政治及軍事紛爭不已的情勢下，為了避免「亡黨亡國」，乃重新考慮如何重建國家制度和整合意識形態，激勵人民追求國家的目標，以使中國從一個萬能的帝國轉變成為一個集權制的現代民族國家。從某種意義上說，國家主義確實是中國苦難的產物，但是，它又極容易因此淪為專制主義的掩體。在上個世紀初，無政府主義在思考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時，首次提出並堅持社會優先權，把國家當作最大的政治偶像加以破壞，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在中國，它不失為一種普遍而狹隘的「愛國主義」的解毒劑。

無政府主義者在理論上否定國家，解構國家；與此同時，鼓吹一種外在於國家的自治意識。實際上，在民國初期，人們已經着手進行聯省自治的政治嘗試了。從無政府主義的基本立場來說，所謂自治是指自治社會，以自由個體為基礎的有機社會，這種社會是只能存在於政治之外的；但是在策略上，他們並不反對地方自治，畢竟多元勝於一元，在相當程度上可以弱化中央集權的控制。

青年毛澤東就是一個鼓吹地方自治的狂熱分子。五四運動過後，他撰寫了一系列文章，主張「民眾的大聯合」。提倡民選，公投，甚

至公開「分裂」，「打破沒有基礎的大中國，建立許多的小中國」；呼籲實行「各省人民自決主義」，從湖南做起，建設一個「湖南共和國」。他在〈反對統一〉的文章中，開篇便說：「中國的事，不是統一能夠辦得好的」，又說：

中國這塊土內，有中國人和沒有中國人有什麼多大的區別？在人類中要中國人，和不要中國人，又有什麼不得了的關係？推究其原因，吃虧就在這「中國」二字，就在這中國的統一。現在唯一救濟的方法，就在解散中國，反對統一。⁴

毛澤東不只一次說到「聯邦制」。他早就指出，歐美是先有邦，然後才有聯合的；而中國並沒有邦，只好努力造邦。三十年代會見美國記者斯諾（Edgar Snow，1905-1972）時，還說過「中國聯邦」。但是，結果是自治的邦並沒有造成，留下的只是一個「理想國」，一個政治烏托邦。從那時候起，政治強人就致力於中國的統一，除此之外，並沒有給出第二條道路。嘗試很快結束了。不過，應當看到，無政府主義的革命設想是否可行已經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個批判絕對國家的視角，使人們能夠以一種新的方式設想未來。

辛亥革命過後，由於留學生運動和白話書報的影響，中國人開始覺悟作為奴隸國民的地位而日益不滿，渴望改變日常生活中的被奴役狀態，實現自我解放。無政府主義正是在爭取個人自由方面，最大限度地體現了時代的要求。五四時期，打倒偶像崇拜，重估一切價值，幾乎所有破壞性的行動，都是無政府主義在興風作浪。尼采⁵、易卜生⁶得以作為新偶像流行一時，就因為他們的思想代表了個人主義、無政府主義。魯迅說自己的思想是「無治的個人主義」⁷，其實也就是無政府主義。

無政府主義對整個社會革命的設想，都是以解放個人為基點的。他們認為，除了國家，家庭是承載傳統文化的主要機構，專制政體的胚胎，必須加以摧毀。於是，我們看到，許多青年人上演了背叛家庭的戲劇，並由此走上革命的道路。廢除帝制以後，儒教價值觀中關於忠君的部分已經失去了效用，但是「三綱五常」一類封建禮教，仍然維繫着中國家庭，成為世代人們的精神桎梏。這時，「打倒孔家店」勢在必行，道德革命，男女平等，自由戀愛，昔日大逆不道的行為轉而成為一種新時尚。鑒於宗法制度的罪惡，不少無政府主義者決定廢姓。五四運動時，周恩來使用抽號碼的辦法重新為自己命名，抽到五號，即取名「伍豪」。

在各種無政府主義派別中，鼓吹施蒂納式⁸的極端個人主義的人數很少，尤其到了五四時期，以黃凌霜，區聲白為代表的派別日益壯大。他們繼承師復的道路，宣傳「有社會的無政府主義」，克魯泡特金式的「無政府共產主義」，突出「群」的意義。無政府主義者以維護個人自由為第一生命，反對個人服從組織，但是並不等於拒絕組織；他們只是拒絕等級森嚴的、強制性的組織，拒絕對個人的思想和行動進行集中化管理，拒絕將運動從屬於一個中心。正如美國莫里·布克金⁹在七十年代描述「匱乏時期以後的無政府主義」時說的：「自我在革命中必須總是能夠辨認的，而不是被革命所壓倒。自我在革命過程中必須總是能夠覺察的，而不是被革命所淹沒。在『革命的』詞彙中，再沒有比『群眾』這個詞更有害的了。革命意義上的解放是涉及社會各個方面的自我解放，而不是背後隱藏着特權階層、統治集團及國家統治的『群眾解放』或『階級解放』。」¹⁰

個人與群眾、個人與組織、個人與社會的矛盾張力一直貫穿於無政府主義活動中。無政府主義者否定國家和其他權力機構，旨在消除組織在個人關係中的媒介作用，唯靠一種自由契約把個人聯合起來，自下而上地組成大小「社會」，並使個人和社會之間的辯證關係得到



五四前後出版的部分無政府主義報刊

自由發展。為此，要求每個人在共同行動中保持高度的道德自覺是必要的。

就是說，無政府主義者不但是社會革命的堅定的宣導者，而且還必須成為革命自覺的踐行者。在新文化運動期間，他們確實做了大量實驗性、開拓性的工作。為了培養國民的科學思想和民主習慣，他們組織和參與青年學生運動，從事學校正規教育的改革，鼓動「到民間去」，成立平民學校、夜校、演講團，進行改變日常生活的教育。是無政府主義者創立了中國第一個現代工人聯盟，廣州、湖南等地先後都有不同名目的工會，到了二十年代上海成為無政府主義工團的中心。也是無政府主義者首次提出農村革命，並促成革命運動向農村的轉移。早在 1915 年左右，師復的追隨者已經開始進行農村公社的試驗；五四運動期間一批青年知識分子發起「新村運動」，在城市激進派中宣傳一種農村傾向的社會改造試驗，意義更為深廣。當時，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任職，對「新村」頗為嚮往，曾準備在湖南長沙嶽麓山實行這一計劃。無政府主義者通過在城市和農村的組織活動從教育到生產的不同形式的實驗，為新文化運動提供了一種與政治相對立的革命範式。

無政府主義者，反抗的男男女女，是一代新青年，一群夢想家。當他們以西方的異質的文化觀念構築社會烏托邦的時候，就不能不激烈地批判固有的東方文明，掃蕩現存秩序中的一切。他們一旦行動起來便毫不妥協，道德上的絕對主義要求鬥爭必須徹底；為了克服巨大的歷史惰性，他們付出成倍的犧牲作為代價。但對此引發的近於「過激」的現象，後來自以為穩健的官僚學者據說通過反思、再思，發現五四人物有破壞而無建設。事實上，這是一種誣詞。

正如巴枯寧¹¹指出的，「破壞是創造的手段之一。」何況，新文化運動確實湧現出了不少新事物，像工團活動和法國工讀活動，都是前所未有的。無政府主義者致力於為青年提供一個自由、平等的生活空間，他們以自己的活動啟動了整個社會運動。從本質上說，他們並不限於批判現實世界，重要的是改變這個世界，他們要改變的，也不僅限於思想，而是要改變每天的生活，真實的生活。

中國幾千年死氣沉沉，只有到了五四時期，才頭一次發現青年的存在。青春勃發的力量是多麼偉大，多麼振奮人心！運動中的活躍分子，《湘江評論》的創辦者毛澤東在成為共產主義者之後，回憶當年的活動，依然滿懷激情：

獨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頭。看萬山紅遍，層林盡染；漫江碧透，百舸爭流；鷹擊長空，魚翔淺底，萬類霜天競自由。悵寥廓，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

攜來百侶曾遊，憶往昔崢嶸歲月稠：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¹²

1945年8月，毛澤東在重慶會見各界人士。據說他見到巴金時，頗感訝異，說：「奇怪，別人說你是個無政府主義者。」巴金回答說：「是的。聽說你從前也是。」¹³